

曾国藩

文体观研究

吴未意 岑亚霞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前言

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以及文化史上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与重视的显赫人物，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文体学家，也几乎没有专门的文体论篇章，但是，其日记、书信、读书笔记以及文章选本等中却体现了丰富的文体观。虽然这些观点是零散的、感悟式的，深深烙着主观的印记，但其中闪耀的真知灼见的光芒却难以掩盖。整理这些文体观，分析其中的优胜处，是一项发掘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工作，使人兴奋、快乐。

刘勰言：“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曾国藩却能做到不以体废文，优则取之，虽亦有己之偏好，却能“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体现了其“博观”的文章视野以及开阔、公正的心胸。与此相连，曾国藩认为骈散相通、“通一艺而通众艺”，故写作练习应众体兼顾，“行之有常，将来百川分流，同归于海”。

曾氏《经史百家杂钞》是一部极具特色的文章选本，其最大特色在于一反自《文选》以来总集不收经、子、史的传统，将经、子、史传文收录于各体文章之端，以真正“尊经”，同时，使经、子、史传文更便于学习、揣摩，充分发挥其文章源头与表率之作用。

于该书中，曾氏还为我国古代文体论带来两项重大突破：其一，门下设类，类下括体，文体分类门、类、体三级而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括体详尽，真正实现了我国古代文体分类的以简驭繁，化繁为简；其二，将文体分类标准统一于功用，在中国古代第一次从整体上实现了文体分类标准的统一。

对奏疏、赋、序、铭、八股文等文体，曾国藩也皆有独到的认识与写作心得。如将时文“典”“显”“浅”三字诀应用于奏疏的写作；将训诂融入赋作，提倡“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直指时弊，反对赠序、墓志铭的过谀，要求实事求是；认为八股文亦应趋时，对策勿空等。“廓大”的学术、文章视野，公正的态度，大胆的指称，务实的追求使这些文体观熠熠生辉，引人注目，即使在今天，亦难否其中的正确与科学性。

是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开阔的学术视野，精深的为文功夫，坦荡、公正的心胸铸就了曾国藩文体观中的耀眼光芒。苏轼云，“文如其为人”，考辨曾氏文体观，亦宛若得见其人：渊博、开阔，务实、严谨，公正、坦荡……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曾国藩文体观总论	(13)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体及文体论概述	(13)
第二节 曾国藩文体观二则	(28)
第三节 曾国藩的文体范畴观	(35)
第四节 曾国藩的文体分类观	(48)
第二章 曾国藩的体裁观	(63)
第一节 关于奏疏体	(63)
第二节 关于赋体	(69)
第三节 关于序体	(76)
第四节 关于科举应试文体	(83)
第五节 关于铭体	(89)
第三章 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及其对文体观的影响	(97)
第一节 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及其形成	(102)
第二节 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对其文体观的影响	(114)
结 语	(122)
参考文献	(127)



绪 论

一、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及研究概况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成，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62年时间里，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代。“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时期，是中西文化大冲突和大交汇的时期，是封建社会全面衰败和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产生的时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炽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未有之‘奇变’‘巨变’的时期。”^①而曾国藩正是这个关键时刻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文人统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战“功”显赫，声名鹊起，一时誉满朝野，官至两江、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身居高位而领先实践洋务运动，处理一系列涉外要事等。正是由于所处历史时刻的关键性和所居地位的重要性，曾国藩在吏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举措，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

^① 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5期。

一个显赫而又颇具争议的人物。可以说，一部曾国藩评价史就是一部血泪毁誉史。时代不同、阶级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对他的评价就会不同：曾国藩在世时为朝廷高度褒扬，被誉为“中兴勋臣冠者”，立功、立德、立言三立完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反革命民族主义和反满民族主义的酝酿和发展，对曾国藩开始毁誉兼有，评价参差不齐；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时期，曾国藩在文化层面赢得了全国知识界的普遍推崇；20世纪30年代到1957年，曾国藩在大陆被全盘打倒，被称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反动头子”等；1957年至1978年，对曾国藩的研究与评价进一步成为“禁区”，无人涉足，而这两个时期，台湾地区学界则一定程度受蒋介石对曾国藩褒举的影响，全盘肯定、褒扬曾国藩，誉之为“圣人”“完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大陆，一段时间内曾国藩仍处于被总体否定的地位，如1988年朱东安发表《评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一文，仍然从文化、洋务运动、军政改革等方面总体否定曾国藩，但在此期间，曾国藩的某些方面开始得到肯定；20世纪90年代，终于迎来曾国藩评价史上的又一个春天——曾国藩基本上被全面肯定，如1995年徐泰来教授发表《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一文，从镇压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化、主要外事问题的处理等方面总体肯定了曾国藩，认为“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

前 60 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①。以上主要是将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评价。在文化层面，曾国藩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理学最后一儒，儒家文化晚期的代表人物，因而曾国藩作为一个文化人物亦随着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文化立场而相应地被毁誉。但是，曾国藩的治学、治家方法却是任何时期（除“禁区”时期外）、任何阶级、任何人都一致褒扬推崇的。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文化史上如此显赫而又颇具争议的人物，自 1872 年逝世以后，世人对其著述、资料的整理、编辑出版及研究就一直不断（当然“禁区”时期除外）。其著述面世的有多种版本的全集类、专辑类、年谱大事记、选编类等，丰富、全面。至 2006 年，至少有 11 位不同的作者写作了曾国藩传记，关于曾国藩的研究著作在 50 种以上。1995 年以前就已经出现过两次“曾国藩热”：一是 20 世纪 40 年代，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现了关于曾国藩的各种著述 40 多种，曾国藩的影响甚至波及海外，如日本川崎三郎著《黄种之四大伟人》就将曾国藩列为其中之一；二是 20 世纪 90 年代，在文化界、政界、商界掀起了“曾国藩热”，如 1994 年台湾地区主办了“曾国藩双甲子学术纪念活动”^②，1995 年 11 月在曾国藩的故乡——湖南双峰（原湘乡县）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全国包括台湾地区在内有 17 个省市及韩国的专家、学者共 100 余人出席了

^① 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 年第 5 期。

^② 参见薛麒麟：《“曾国藩热”透视》，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 年第 1 期。

此次盛会，主要探讨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等问题。从中国知网收录文献的情形看，1994年以后关注曾国藩的文章数量呈飞速上涨趋势。80年代初每年仅有几篇文章，1994年则跃至40多篇，1995年即第二次“曾国藩热”之时，已有关关注文章90多篇。1997年以后，对曾国藩的关注稍有回落，但仍然保持在每年30~60篇文章。2003年以后对曾国藩的关注再次升温，2005年、2006年关注文章已达每年100篇左右。2007年至2014年，曾国藩关注热继续上升，以曾国藩为主题词的关关注文章每年为150~200篇，关注热度可以说是前两次“曾国藩热”的数倍以上。并且关注范围非常广泛，从对其历史功过、是非问题的探讨，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评定，到对其宦宦、吏治思想与实践，军事、战略思想与实践，外交思想，洋务思想，家教思想，人才思想，养生思想，理学经世思想，修身之道，伦理思想，学术思想，治学之精神与方法，文化人格，哲学思想，海防思想与实践，后勤保障思想，书论，古文理论，诗论等的研究，到关于他与湖湘文化、中国近代教育、近代中国出版、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和近代化、近代中国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事业、近代中国科技等关系的研究，近年还出现了曾国藩研究的新视域——曾国藩的档案意识等。曾国藩研究俨然已经成为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显学。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此受到长时期的广泛关注与重视的历史人物是少有的。

二、曾国藩的文论成就及研究简况

曾国藩一生留下了计千万言的文字，有诗作、文章、日记、奏议、书信以及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

等。其中阐述或反映曾国藩文艺思想的文字所占分量相当大。曾国藩的文艺成就历来被人们高度褒扬，他在世时为咸同文人所归向，被桐城派传人誉为“文章领袖”；逝世后亦被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弟子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纂叙》中高度评价曾国藩：

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挈揽众长，辄归（有光）掩方（苞），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①

其认为曾国藩胜过归有光、方苞，能与欧阳修比并。如果说门人有过誉之嫌，那么，曾经试图为太平天国出谋划策、学贯中西的近代思想家、教育家王韬也曾说，曾国藩“文学足以并孔、邢、欧、曾而无愧色”^②。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赞誉曾国藩是虽受桐城派洗礼，但能摆脱桐城弊病，别树一帜的“一代卓越的古文家”^③。2001年国学大师钱仲联主编“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将曾国藩与明朝刘基、归有光、王世贞，清朝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七大家并列。同时，曾国藩还被认为是近代诗歌史上的重要人物，是晚清几个重要诗派中影响较为深远、成就较高的宋诗运动的领袖

^①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拙尊园丛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76册，第80页。

^② 王韬：《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弢园文新编》，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7页。

^③ [日]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杨铁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人物如，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所说：“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湘乡曾国藩……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新之功……国藩识巨而才大，寓纵横诙诡于规矩之中，含指挥方略于句律之内，大段以气骨胜……”^① 钱基博先生不仅高度评价了曾国藩的诗歌创作，而且指出了他在宋诗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曾国藩在清朝晚期文坛上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与他身居要位密切相关。正如清末民初文坛著名人士陈衍（1856—1937）在其《近代诗钞》序中所指出的：“有清三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② 曾国藩不仅被誉为文学家，近代诗歌、散文史上的重要人物，还被誉为书法家。祝嘉编著的《中国书学史》就将曾国藩列入其中。

曾国藩在文艺创作实践领域成就如此之高，地位如此之重，但在他本人看来，其文艺理论成就要高于其创作实践成就。他生时多次感叹自己于诗、文、书之“道”“门径”多有所得，只是无暇未专，“不克卒业”“憾吾能知之而手不能为之耳”^③（庚午正月日记）。他自信于古文之道“能识古人堂奥”“十分已得六七”^④（辛酉正月日记），只是“惜无宽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② 陈衍：《近代诗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序第1页。

③ [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83页。

④ [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78页。



闲岁月竟其所学耳”^①（辛酉正月日记），等等。当然，后人对曾国藩文艺理论的成就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认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不仅集桐城派之大成，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对于整个中国古文理论批评的一次小结”^②。在诗论史上，曾国藩也被认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实际上，无论是曾国藩的文艺创作还是文艺理论思想，虽然历来都被高度褒举，但一直都只是笼统地褒扬。相对于曾国藩这个研究客体其他方面的研究来看，对曾国藩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思想的深入研究，长期以来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学界对曾国藩文艺思想的研究开始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不断发展，但到2006年为止还基本处于一种研究少、断续、零散，专注于某个方面，缺乏全面性、系统性，没有形成争论的研究状态。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曾国藩的古文理论上，对诗论的研究较少。对古文理论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曾国藩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上，除此之外，就是对曾国藩一些主要观点的探讨，如重经济、重义理、汉宋兼容、道文兼尽、骈散相通、古文八字诀、古文四象、文气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等观点以及曾国藩对“阳刚之美”“珠圆玉润”等风格的追求等。较为深入的是对曾氏读书方法、阅读理论的研究。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论文的情况来看，2006年之前对曾国藩文艺思想的研究较为集中的有三个年份：其一是1985年，论文

① [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页。

②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0页。

4篇，这一年基本处于对曾氏文艺观点进行初步归纳整理的起步阶段；其二是1996年，在1995年11月湖南双峰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递交了10余篇有关曾氏文艺思想的论文，曾氏的对联观、书法观等开始受到关注；其三是2001年，论文8篇，曾氏古文观与诗学观开始被连成一个整体来看待。此后至2006年，虽然对曾国藩其他方面的关注相当多，但是对其文艺思想的研究却基本停滞。而2006年之前，对曾国藩文艺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基本上没有。曾国藩文艺思想研究的这种状况与曾国藩并没有将其文艺方面的见解与主张写成系统的理论著作，而是散见于其数量庞大的各类著述之中，造成研究者收集原始材料比较困难有关；同时也与曾国藩的文艺思想本来就比较散有关。

2006年以后，随着曾国藩著述的全面整理、出版和面世，曾国藩的文艺思想也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2006年至2014年间，曾国藩文艺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博士学位论文《曾国藩诗文思想研究》^①《曾国藩与桐城中兴》^②《曾国藩与道家思想》^③；硕士学位论文《曾国藩的文体观研究》^④《曾国藩文学思想研究》^⑤《近代转型中曾国藩的文艺思想》^⑥

① 代亮：《曾国藩诗文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② 邵红红：《曾国藩与桐城中兴》，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③ 彭昊：《曾国藩与道家思想》，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④ 吴未意：《曾国藩的文体观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⑤ 胡影怡：《曾国藩文学思想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汪磊：《曾国藩文学思想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孙竞：《曾国藩文学思想研究》，重庆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⑥ 刘情：《近代转型中曾国藩的文艺思想》，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曾国藩文学思想探析》^①《曾国藩古文文体论研究》^②《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编选特色的研究》^③《曾国藩的文化情怀及其散文理论与实践》^④《论曾国藩对联》^⑤等；期刊论文《曾国藩诗文鉴赏论》^⑥《曾国藩诗学理论平议》^⑦《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⑧《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⑨《曾国藩文论浅札》^⑩《曾国藩赋学观点试探》^⑪《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⑫《曾国藩的诗文作家论》^⑬《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论〈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中的训诂

① 刘兆军：《曾国藩文学思想探析》，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② 谢鹏：《曾国藩古文文体论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③ 左政：《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编选特色的研究》，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④ 倪冬霞：《曾国藩的文化情怀及其散文理论与实践》，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⑤ 张小华：《论曾国藩对联》，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⑥ 龙志坚、张静：《曾国藩诗文鉴赏论》，载《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⑦ 黄伟：《曾国藩诗学理论平议》，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⑧ 郭前孔：《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⑨ 李和山：《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⑩ 许丽英：《曾国藩文论浅札》，载《学海》，2007年第5期。

⑪ 孙福轩：《曾国藩赋学观点试探》，载《船山学刊》，2007年第3期。

⑫ 金庆国：《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载《第三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

⑬ 翔云：《曾国藩的诗文作家论》，载《孝感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观》^①《试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②《曾国藩文艺思想拾零》^③《曾国藩的散文创作与文学批评》^④《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⑤等。总之，2006年以后，对曾国藩文艺思想的系统研究逐步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研究现状及研究缘起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曾国藩的文体观。众所周知，文体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两层含义：一指文章的体裁、体制，一指文章的风格。赵毅衡先生从符号学视角将“体裁”定义为“符号文本的文化类别”“文本的文化分类程式”^⑥“文本与文化之间的‘写法与读法契约’”^⑦。简单而言，体裁即指在具体的应用语境中使用的文本样式，它在语言形式、篇幅、内容、组织结构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规定性。“风格”一般指“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作家创作个性”^⑧。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的“体”，《文心雕龙·序志》“去圣未远，

① 赵永刚：《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论〈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中的训诂观》，载《贵州文史丛刊》，2008年第2期。

② 程伊杰：《试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载《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③ 朱剑宇：《曾国藩文艺思想拾零》，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④ 张思齐：《曾国藩的散文创作与文学批评》，载《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⑤ 武道房：《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

⑥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⑦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⑧ 《文学理论》编写组：《文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①中的“文体”，唐代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论体”^②篇中的“体”皆指风格。实际上，一定体裁的文章有与其相应的一定的风格特征，所以两层含义关系密切。本书所论“文体观”限于文章的体裁、体制层面，若将标题更为“体裁观”，则嫌狭窄，且“体”更合古人说法，故采用“文体观”，特此说明。

曾国藩骈散相通的文体主张虽然早为学术界提起，但对曾氏文体观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在2006年以前基本上是无入涉足的处女地。2006年以后，曾国藩文体观研究陆续展开，主要成果除2006年的《曾国藩的文体观研究》外，2007年以后主要有《曾国藩古文文体论研究》《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编选特色的研究》《曾国藩的文化情怀及其散文理论与实践》《曾国藩赋学观点试探》《试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等论文。《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编选特色的研究》一文注重对《经史百家杂钞》作为文章选本编选特色的系统研究，对其中的文体观关注较少且浅，主要指出了选本重视公文等应用文体与注重功效之类比较明显的文体观，对《经史百家杂钞》中较为细致的文体观的研究较为欠缺。《曾国藩的文化情怀及其散文理论与实践》一文仅粗略提及曾国藩对政论文、叙事文、日记体写作的一些观点。此两篇论文并非专门研究曾国藩的文体观，虽然对曾氏文体观有所涉及，但明显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曾国藩赋学观点试探》《试

①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页。

② [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论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152页。

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二文对曾国藩赋与奏疏两种体裁的观点进行了专门研究。《曾国藩古文文体论研究》是曾国藩文体观研究较全面、系统的成果。该文从体裁与风格两方面分析了曾国藩的古文文体论，从接受者与写作者两方面分析曾国藩的古文体裁论。在接受者层面，主要分析了曾国藩对奏疏、赋、时文、墓志铭四种体裁的要求；在写作者层面，主要分析了曾国藩对经史百家辞的广泛重视以及认为古文之道骈散相通的观点。论文还简单探讨了《经史百家杂钞》的编选及其体裁学意义。该论文对曾国藩文体论的观照具有一定的全面性，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如，该论文流于观点梳理，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分析与思想原因的探讨，因此内容比较单薄。

综观 2007 年以后曾国藩文体观研究的诸多成果，我们深感对曾国藩文体观仍需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本书意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指导方法下，运用美学和系统的方法，从宏观、微观、纵向、横向多方位进一步深入探讨曾国藩的文体观，以进一步推进曾国藩文艺思想的系统研究。

第一章 曾国藩文体观总论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体及文体论概述

—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中国古代“文”“文学”“文章”等概念的具体内涵。“文”“文学”“文章”的内涵在我国古代不是一成不变、单一的，而是不断变化、几种含义同时并存的。“文”早在先秦就出现了，最初是象形字，象纹理纵横交错之形，即“文”的本义是交错的意思，如《诗经·小雅·六月》中“织文鸟章，白旆央央”^①之“文”。后来，“文”多引申为学问的意思，如《论语·雍也》中“君子博学于文”^②之“文”等。“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先进》中：“文学，子游、子夏。”^③“学”是“学识”，“文学”

^① 《诗经·小雅·六月》，《诗经鉴赏辞典》，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页。

^② 《论语·雍也》，孙钦善译注：《论语注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98页。

^③ 《论语·先进》，孙钦善译注：《论语注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174页。